



百餘年來漢賦與《詩經》學關係研究回顧與反思

Reflections on Over 100 Years of Han Dynasty Fu and *Shijing* Related Research

王思豪 (Wang Sihao) *

一、前言

有漢一代，學術最爲昌明而隆盛者，舍經而誰？有漢一代，譽爲一代之文學者，非賦而誰？《詩經》學爲漢一代之重要學術，漢賦爲漢一代之重要文學。歷經頻仍的戰亂，文籍大都殃滅成土，漢代賦家可資借鑒的思想文化資源、文學創作源泉及經驗，相當匱乏。章學誠謂「三代以後，六藝惟《詩》教爲至廣也」。¹ 三代以後，文章之用，莫盛於《詩》。《六經》之中，唯獨《詩經》屬於後世所謂純文學的範疇，漢賦作家浸潤《詩經》既久，必潛移默化之。緣此，《詩經》的經典意義對漢賦創作的影響與潤澤，漢賦的創作對《詩經》經典意義的闡釋與傳播，其深遠、其廣大，遠非我們今人所可想見。可是人們又希冀有所獲得，於是圍繞本論題所展開的討論，經久不絕。20 世紀以來，此論題更是成爲

漢代文學與學術研究的一個重鎮，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然而在探討的過程中，也是爭議紛紜，出現諸多困惑，乃至不足。這些困惑與不足呈現混沌情形，自然會影響到現代學者的賦學研究，因此，亟需對百餘年來「漢賦與《詩經》學關係」研究的論述進行系統地梳理、檢討和反思，這於當前的賦學研究有釐緒開源之作用，裨益於此論題向更深層次地探討。

二、「賦者，古詩之流」說解讀中的諸多爭論

漢賦與《詩經》學之關係，要從源流上說起。賦體源流雖然眾說紛紜，² 但班固所宣導的「賦者，古《詩》之流」³ 說是眾流中的主流，這一點毋庸置疑。「賦者，古《詩》之流也」，我們稱之爲「賦之《詩》源說」，是

* 作者爲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人員、南京大學文學博士。

1 章學誠，《文史通義》（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8），〈內篇一·詩教下〉，頁 21。

2 賦的淵源眾多，莫衷一是，舉要有五：一是《詩》源說。班固云：「賦者，古《詩》之流也。」左思〈三都賦序〉云：「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皇甫謐〈三都賦序〉也說：「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二是《詩經》、《楚辭》說。劉勰云：「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祝堯云：「原最後出，本《詩》之義以爲《騷》……但世號《楚辭》，初不正名曰賦，……自漢以來，賦家體制大抵皆祖原意。」三是《詩》、《騷》、諸子說。章學誠云：「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又謂漢賦「兼諸子之餘風」。四是源於縱橫家言說。姚鼐《古文辭類纂》將《戰國策》中的〈楚人以弋說頃襄王〉、〈莊辛說襄王〉列入「辭賦類」。劉師培《論文雜說》亦云：「詩賦之學，亦出於行人之官。……行人之術，流爲縱橫家……欲考詩賦之流別者，盍溯源於縱橫家哉？」五是源於隱語說。王闓運謂：「賦者，詩之一體，即今謎也，亦隱語，而使人論諫。夫聖人非不能切戒臣民，君子非不敢直忤君相，刑傷相繼，政俗無裨，故不爲也。莊論不如隱言，故荀卿、宋玉賦因作矣。」朱光潛《詩論》云：「隱語爲描寫詩的雛形，描寫詩以賦規模爲最大，賦即源於隱。」徐北文《先秦文學史》承襲此說。

3 此說可能不是班固首創，因爲前有「或曰」一語，蓋引用前人之言，但班固贊同這種說法，他認爲漢賦是「雅頌之亞」。結合班固〈兩都賦序〉中的語境，此說中的「詩」應指《詩經》。

目前所見的關於詩、賦關係的最早的概念性表述，這個學說貫穿於賦學研究的始終，歷來議者如雲，如左思、皇甫謐、虞摯、劉勰、顏之推、白居易、祝堯、吳訥、程廷祚、姚鼐、曾國藩、劉熙載、王闓運等，都對其做了闡發與鼓吹。進入 20 世紀以來，學界對其解讀也產生了眾多紛歧，總而言之，蓋有賦用、賦體兩端。

從賦用的角度解讀賦之詩源說者認為賦繼承了《詩》教傳統，著力於政治功用，即諷諭美刺，合於法度。民國時期，來裕詢在《漢文典·文章典》卷 3 第 3 節「賦」條云：「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義在托諷，是為正體。……〈上林〉、〈甘泉〉極其鋪張，而終歸於諷諫，則有風之義焉。〈兩都〉、〈兩京〉極其炫耀，終折以法度，則有雅、頌之義焉。〈長門〉自悼，緣情發意，托物起興，詞極和平從容之概，則有比興之義焉。此古賦也。」⁴ 賦繼承了六藝中的詩教傳統，兼有「風、雅、頌、比、興」之義，終歸致力於社會功用。這也正如朱傑勤所說：「六藝之中，惟詩教最寬……善乎章學誠之言曰：『學者惟拘聲韻之為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詩教，是以後世文集繁，而紛紜承用之文相與沿其體而莫由知其統要也。』賦之草創，實包涵於詩體之中，及其蛻化過程中，其流漸大，其用日廣，為縉紳先生所樂道，其形式由簡而繁，由質而文矣。」⁵ 朱氏引用章學誠〈詩教〉之言，認為賦孕育在詩體之中，指出賦的由簡到繁，由質到文的過程只是因為「其用日廣」。馮俊傑也指出：「班固『古詩之流』說的主要依據是『諷諭之義』，或稱『古詩之義』，亦即『惻隱』、『風諭』、『抒下情』和『宣上德』之類，均屬文學的思想內容和社會功利方面。」⁶ 李湘認為「班固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還說道：『賦者，古詩之流也。』……其實，按其上下原文，這只是說漢賦對《詩

經》的思想繼承，如或通諷諭，或宣上德等等，並未有一字涉及體制的。與六義之『賦』和所謂的『不歌而誦』之賦均無多大關係。」⁷ 盛源也持類似觀點，指出：「班固言賦為古詩之流，目的在於表明自己『祖述』古人為詩『風諭』而作〈兩都賦〉，『以極眾人之所眩，折以今之法度』（〈兩都賦序〉）。班固固於古代誦讀和『詩義』，他的辨析還僅局限於功政作用等外部關係方面，並沒有對賦的源流體變及其原因作出深入的闡發。」⁸ 陳贊認為「班固『賦者古詩之流』不是一個以文體特徵為基礎的文體源流判斷，而是一種史學家、經學家對賦體文的政治要求」，而是「意在闡發賦體諷諭觀」，正因為如此，「在經學背景下，漢人賦論執著於理想的『諷諭』而批判現實的『靡麗』」。⁹ 陳韻竹在其博士論文「論賦之緣起」中認為班固所說的「賦者，古詩之流」，「其所指涉並不在於詩藝與詩法的淵源傳續，而在於賦詩以諷諫怨刺的詩義與詩用」。¹⁰ 朱錦雄認為「在賦作中呈現詩的本質義與功能義，成為理所當然之事」，所以「所謂賦體乃『古詩之流』、『雅頌之亞』的論述，當然也順理成章的成為事實」，¹¹ 也強調賦對《詩》之功能義的繼承。

《詩》有六藝，六藝又有「三體三用」之說，因此「賦者，古詩之流」說，完全從政治功用的角度來理解，是欠妥當的，我們也應該重視其作為文體特徵的賦體源流。劉衍文撰成於民國 35 年的《雕蟲詩話》在卷 2 論述「賦體之起源」時，即主「古詩之流」說，一方面認為：「鄭玄《周禮·宗伯下·大師》中釋『六詩』，於『賦』曰：『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則義兼美刺」，認同賦是用來陳述政教善惡和美刺的，但又同時指出：「劉勰《文心雕龍·詮賦》曰：『賦者，鋪也，採擷摛文，體物寫志也。』摛文，作文，布文也。又曰：

4 來裕詢，《漢文典·文章典》卷 3（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13），頁 45。

5 朱傑勤，〈漢賦研究〉，《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1（1934.3）：114。

6 馮俊傑，〈賦體四論之一：賦是「古詩之流」辨〉，《山西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86.1：68。

7 李湘，〈《詩經》與後世文體之賦之間的源流關係〉，《山東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88.3：65。

8 盛源，〈論漢魏六朝的賦體源流批評〉，《延安大學學報（社科版）》1989.3：27。

9 陳贊，〈「賦者古詩之流」再探——論漢人的賦體諷諭觀〉，《貴州文史叢刊》2007.3：16。

10 陳韻竹，〈論賦之緣起〉（高雄：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9），頁 356。

11 朱錦雄，〈論班固「賦論」中之體源觀〉，《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18：37。

『六義附庸，蔚爲大國。』是言其辭兼及其體也。」又引《漢書·藝文志》「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之語，謂「是賦與詩之離而獨立爲文也」，從而得出結論：「故倘以今語言之，賦之演變，先爲詩之一種創作方法，漸而成爲一種表現手法，終而成爲一種獨立之文學體裁，頗類今之散文詩也。」¹² 瞿蛻園在《漢魏六朝賦選》一書的前言中指出：「賦的原來意義是『鋪陳其事』，爲我國古代文學的表現方法之一。……到了後來，它成爲一種獨立的文學體制，形式介於詩歌與散文之間。但從其淵源來說，它是詩歌的衍變。所以班固說：『賦者，古詩之流也。』」¹³ 高光復認爲「賦者，古詩之流也」，「我們應該從另一個角度賦予這個觀點以新的含義：賦，主要是從《詩經》的六義之一發展而來的；賦，從《詩經》中繼承發展的主要是鋪陳的手法。」「從總體上來說，賦這種體裁與作爲《詩經》六義之一的賦這種手法之間的關係則是最爲清晰，最值得重視的。」¹⁴ 康達維的觀點也偏向於「賦體」說，他在〈論賦體的源流〉一文中說：「『流』或可作『漂流』，不過我同意龔克昌教授的解釋，即『支派』的意思（參考〈漢賦研究〉197頁）。此外，『流』字也可解作『種類』或是『學派』的意思……由此，『流』也可引申作『文體』的意思，例如摯虞編輯的《文章流別集》，其『流』字即是採用『文體』的意思。由此班固主張『賦者，古詩之流』，是說『賦』是《詩經》之一體。」¹⁵

范文瀾在《文心雕龍·詮賦》的校注中說道：「賦、比、興三義並列，若荀屈之賦，自六義之賦流衍而成，則不得賦中雜出比、興。今觀荀、屈之賦，比、興實

繁，即士蔦所作，有狐裘尫茸語，三句之中，興居其一，謂賦之原始，即取六義之賦推演而成，或未必然。」李伯敬亦撰文贊同范說。¹⁶ 也有提出商榷者，如孫堯年即撰〈《賦體源流辨》駁議〉¹⁷ 一文與李伯敬商榷，指出根據史實，班固的賦源於詩說並無錯誤。爾後，李伯敬又發表〈賦體之源不在古詩內部〉一文反駁孫說，¹⁸ 其實他們所論的不是同一個層面的話題。曹明綱〈論賦與詩六義之「賦」的關係〉對褚斌傑和李伯敬的觀點提出商榷，他認爲：「賦與詩六義之『賦』的源流關係是存在的；不過不像傳統觀念所認爲的那樣，表現爲賦體作品繼承了詩的鋪陳手法和口誦傳統。賦這種文體的表現手法、名稱由來，乃至形體特徵的確立，都與此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繫。」¹⁹ 徐宗文則從賦與詩的各自特點的比較研究出發，從賦與詩的意義功用、題材內容、表現手法以及語言形式等四個方面綜合討論，認爲賦與詩「有相同、互通之處」，最後得出結論是：「班固謂『賦者，古詩之流也』，信未爲過。」²⁰ 馬積高從「賦體的形成、演變」和「賦、詩在內容和表現藝術上的交互影響」兩個方面論述賦與詩的關係，認爲：「賦雖兼眾體，有的頗近文，然就其總體的發展言，同詩相近者多……。」²¹ 簡宗梧在追溯賦體源流時認爲「賦原本是詩的一種體裁，或說是一種作法，發展到漢，學者都已認定爲詩的別類」，從漢人賦論中「都可以看出在漢人心目中，賦和詩有深厚的血緣關係」，「班固『賦者，古詩之流也』是不移之論」，綜合論之，漢賦是「詩的別枝」，「詩的延續」，「詩的擴大」，「散文化的詩」，「敘事描寫的詩」。²²

對「賦者，古詩之流」說的解讀，也有突破成見，

12 劉衍文，《雕蟲詩話》卷2，張寅彭主編，《民國詩話叢編》第6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13 瞿蛻園，〈前言〉，《漢魏六朝賦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頁1。

14 高光復，《賦史述略》（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頁4-7。

15 （美）康達維，〈論賦體的源流〉，《文史哲》1988.1：45。

16 李伯敬，〈賦體源流辨〉，《學術月刊》1982.3：49。

17 孫堯年，〈《賦體源流辨》駁議〉，《學術月刊》1983.10：78。

18 李伯敬，〈賦體之源不在古詩內部〉，《教學與進修》1984.4：17-21。

19 曹明綱，〈論賦與詩六義之「賦」的關係〉，《江海學刊》1984.5：43。

20 徐宗文，〈試論古詩之流——賦〉，《安徽大學學報（哲社版）》1986.2：52-57。

21 馬積高，〈略論賦與詩的關係〉，《社會科學戰線》1992.1：265-271。

22 簡宗梧，《漢賦史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頁120-143。

從新的角度另立新解者。如日本學者鈴木虎雄即不滿於前人從詩六藝的角度來探討賦之詩源說，而是從形式方面來討論賦如何由純為韻文的詩演變為韻散兼備的獨特文體的問題，他在《賦史大要》中說：「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考其理由，即如前述，蓋《詩》以誦聲為寫鋪陳，賦之形式所由生也。如曰賦為《詩》流，要當主此。固不得僅以六義之賦屬修辭直敘之法，為與賦體之事物鋪陳同其性質，而遞謂賦由《詩》出，其故在斯也。」²³ 從誦讀方法等形式方面來揭示賦與詩的關係，這是鈴木虎雄的高明之處。曹虹則敏銳地覺察到了兩漢之際賦學的漸變特徵與「賦者，古詩之流」說提出之間的關係，認為班固「在辨別源流之中寓正本清源之意，以建立某種批評標準和價值尺度」，而這種經由「『法度』與『經義』揉合而成的標準，遂在漢代特定的文化思想漸變的軌跡上得以確立」，這種標準與尺度「與中國古代封建社會長期穩定下的文化結構是相適應的」。²⁴ 許結亦「對賦源於詩的問題，歷來解釋或重『用』，或重『體』」的現象不滿，試辟蹊徑，「從樂制的變遷看楚、漢辭賦的造作，以『功用』的視角為詩與賦的關係提供一種思考」。指出漢武帝設立樂府的制度與獻賦之風有著內在的聯繫，樂制思想的「象德綴淫」與辭賦創作的欲諷反勸是一致的，而且「漢代樂府的內廷娛樂性質與象德綴淫思想的矛盾，辭賦創作欲諷反勸的矛盾，均在樂制的變遷中得以展示」。²⁵ 這些新解為「賦之詩源說」注入了新的活力，裨益於學界對這個問題研究的進一步深入開展。

三、經學夾縫中的漢賦與《詩經》學關係的間接探討

漢賦與《詩經》學的關係的討論，目前已在學術界成燎原之勢，但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卻隱匿於漢代經學與

文學的關係探討之中，偶爾有所提及。儘管只是間接地探討，但其中碰撞出的星星之火，即研究的方法與思路也不容忽視。

章太炎《國故論衡·辨詩》在「小學亡而賦不作」段中即認為風、雅、頌三義皆「因緣經術」，賦所以不同於詩，在於賦以經術之「緒餘」——小學而作賦，即「相如、子雲小學之宗，以其緒餘為賦」，而賦與小學互相融涵，不再以「吟詠情性」為本質特徵，這就是所謂的「詩賦道分」。²⁶ 謝无量繼承太炎「因緣經術」之說，他在《中國大文學史》第3編〈中古文學史〉第4章第4節「詞賦派」中指出：「文人類病不通經術，然古之善詞賦者 猶必以經術為緣飾。司馬相如嘗從胡安受經……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終軍之徒，本詞賦之材，或受業博士，或通經善論義理，並為武帝親信，常在左右。」²⁷ 賦家身分儒生化，作賦自然要以經術來緣飾。陶秋英《漢賦研究》第3篇〈漢賦〉第一章〈漢賦的形成〉第4節論述了漢賦與經學之關係，主要提出了兩個觀點：一是漢賦的發達與經學相對立，「學術和文學往往是相對的」，「經學這東西是比較枯燥的學問，決不是想像豐富、情緒奔放的天才的文學家所願受其拘束的」。正因為如此，「所以一般決不做衛道崇聖的事業的天才者既短於此，遂放其所長於彼，於是賦家輩出，這是經學特盛的反響，成就了辭賦，光明燦爛的發達在漢代，和經學對峙著。」二是經學特盛帶來了文字訓詁學的進行，從而使辭賦創作繁榮，「歷史上的事實，常常是迴圈式的波浪式的，因了文學的進步，研究文字學深通文字學的自然也不乏其人了，而賦也因了文字的進步，更便利它的描寫和鋪陳」，並舉司馬相如〈子虛賦〉為例，指出「文字的進步，幫助了修辭，而使賦也更發揚、更光大」。²⁸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第6章〈漢賦的發展及其演變〉中指出漢賦興盛的原因之一就是漢代「學

23 (日)鈴木虎雄撰，殷石麗譯，《賦史大要》(臺北：正中書局，民國間鉛印本)，頁10。

24 曹虹，〈從「古詩之流」說看兩漢之際賦學的漸變及其文化意義〉，《文學評論》1991.4: 66-71。

25 許結，〈從樂制變遷看楚漢辭賦的造作——對「賦者古詩之流」的另一種解讀〉，《遼東學院學報》2005.1: 1-6。

26 章太炎撰，陳平原導讀，《國故論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89-90。

27 謝无量，《中國大文學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據1918年中華書局本影印)，頁27-28。

28 陶秋英，《漢賦研究》(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頁98-101，此書原名《漢賦之史研究》，1936年中華書局出版，郭紹虞〈序〉稱：「陶女士此著原為民國二十一年燕京大學研究院的碩士論文。」

術思想的統治」，漢武帝以後，儒家定為一宗，徵聖、宗經、原道的觀念成為文學理論的標準，大家都以此指導文學、批評文學，「抒情的浪漫文學，是無法發展的。唯有賦反帶著歌頌與諷諭的美名，古詩的遺意，一天天的滋長發育起來了。」並指出漢代的「歷史家、思想家、經學家如司馬遷、董仲舒、劉向、班固、張衡、馬融之流，都喜歡作賦的事」，乃是因為賦與「儒家所要求的宗經原道」相合。²⁹

50年代前關於漢賦與經學（包括《詩經》學）的討論，已經看出了幾種不同學說的雛形，即漢賦與經學的「對峙說」、漢賦是經學的「附庸說」以及「混融一體」說。50年代後，尤其是80年代以來，這幾種學說的爭論也愈演愈烈。萬光治指出在漢代文學史上，經學與賦學之間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即：「經學之士鄙薄辭賦，又往往技癢，時有所作；賦家屬文，惟恐干犯經學，卻常常受到後者的攻擊。經學家竭力想以自己的文學觀規範賦家的創作，漢賦因之受到許多消極的影響；但賦家在創作中不能不受文學規律的支配，在客觀上常常表現為與經學的對抗。」萬氏認為出現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於歷史遺留下來的痕跡和習慣心理……特別是先秦學術思想經漢人改造為經學體系後，它們作為統治階級的理論武器，與政治實踐保持著遠較文學為密切的關係。」所以，「經學視文學為附庸，經學之士的政治地位高於漢賦作家，便成為理所當然的事情。」並以董仲舒、孔臧、王褒、班固等經學家的賦作為例，詳細論述了經學對賦創作的影響，認為經學使漢賦「拖著一條沉重而又極不協調的經學尾巴」，「曲終奏雅」、「勸百諷一」之所以成為漢賦最為突出的缺陷，經學應當負有很大的責任的。³⁰ 劉松來也認為「在漢代歷史上，賦

作為一種代表性文體……由於受到經學的制約，以散體大賦為體式的漢賦的文學性狀並未得到充分展露，而很大程度上淪落為經學話語的附庸」。³¹ 與此觀點不同的是陳松青在其著作《先秦兩漢儒學與文學》的結語〈漢代文學不是經學的附庸〉中認為漢賦不是經學的附庸，「自司馬相如以後，大賦作品用儒家思想來進行諷諫，具有說教的意味，雖有違藝術規律，但就其聘辭的部分而言，無疑是具有文采的」，作者還舉例說明：「這一時期除了表現儒家思想意識的觀念先行的大賦作品外，還有不少表現個人真實內心感受的好作品……這些作品雖然或多或少地帶有儒家思想的色彩，但是卻無法否定它們是運用文學手段創作出來的富有文采的優秀文學作品。」³² 「混融一體」說的贊成者較多，如簡宗梧《漢賦源流與價值之商榷》即指出：「漢代賦家與儒家，源流流長，是有親密的血緣關係的，尤其是有漢一代，賦家依附儒家而求發展，儒家藉辭賦以達目的，同車共轍，相形益彰。」³³ 漢賦創作的變化與漢代經學風尚的演進相一致，經學在不同時期呈現出不同的風貌，漢賦也隨之發生相應的變化，劉培〈經學的演進與漢大賦的嬗變〉一文即認為如此，如武帝時期，董仲舒興「公羊學」，公羊學的「大一統思想」、「屈民申君，把君權絕對化的思想」以及淡薄諷諫，都與司馬相如〈天子遊獵賦〉中的思想相通。元、成時期《詩》學尊顯，「揚雄的大賦接續司馬相如而又深受當時經學的濡染，具有濃厚的宣揚正統儒家思想和重視諷諫的傾向。」西漢末、東漢初的讖緯化經學興起，「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東漢前期的大賦有大量讖緯的內容，並且極力宣揚帝王躬行儒術，諷諫之義基本拋棄了。」東漢中葉以後，古文經學逐漸壓倒今文經學，「受古文經學影響較深的是張衡的〈二京賦〉」，主

29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頁115。按：劉氏《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卷完成於1939年，1941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百花文藝出版社據此本印行，較多地保存了原貌。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本用的是1962年修訂本，此段引用有較多刪節，不用。

30 萬光治，〈漢賦與漢詩、漢代經學〉，《四川師範學院學報》1984.2: 27-35，其《漢賦通論》（增訂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華齡出版社，2004），第11章亦收錄。

31 劉松來，〈經學衰微與漢賦的文體昇華〉，《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02.3: 61-65。

32 陳松青，《先秦兩漢儒學與文學》（長沙：湖南師大出版社，2004），頁339。

33 簡宗梧，《漢賦源流與價值之商榷》（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頁102。

要表現是「〈二京賦〉不言讖緯，行文多依從古文經」，「〈二京賦〉冷靜地批判現實的態度和古文經學家崇實徵信的學風是一致的。」³⁴ 馮良方《漢賦與經學》是當前漢賦與經學研究的一部力作，主要是從經學的角度解讀漢賦，認為「漢賦與經學都是同體共生，難分彼此的」，³⁵ 本於此，該書較為詳細地探討了漢賦與經學之間親和與悖離的現象及其本質。

超脫於這三種觀點之外而另闢蹊徑的是聶石樵的相關論述，他敏銳地觀察到了漢賦作品大量引經據典的事實，指出「西漢王朝尊儒、崇儒的學術風氣，也給這一時期之文學形成以很大影響。……因為要達到『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文人作文作賦都引經據典起來」，揚雄、劉歆賦作便多引《春秋》、《左傳》，「至於崔駰、班固、張衡、蔡邕，乃多採摘經史，使文章寫得華實並茂，成為後人寫作之楷模」。「司馬相如、王褒以前，文人們多馳騁文才而不不求學問，揚雄、劉向以後往往徵引經書來寫文章，這是取捨之分野，是不容混淆的」，「到光武中興以後，很多文人稍改從前之寫法，在文采與內容的結合中，酌量採用經典中之辭藻，這大概由於歷代都聚集學者講經，因而逐漸感染了儒學之風氣。」³⁶ 儘管聶先生的論述有些是從感觀上覺察到的經驗之談，但他所開啓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值得我們學習。在這種學術思路的指導下，筆者撰寫了《〈神鳥傳（賦）〉引經、子文譚論》一文，³⁷ 著意於對尹灣漢墓出土的〈神鳥賦〉引用《詩經》、《孝經》、《老子》、《莊子》中文字的考論，發掘其中的經學、子學價值及其所展現的文學魅力。

四、漢賦與《詩經》學關係的直接關注

漢賦與《詩經》學關係的研究逐漸從經學與文學研究的夾縫中獨立出來，日益得到學界的重視，近年來成為一個熱點問題，取得了不俗的研究成績。

大凡學術研究的增長點有二，除了學術風尚演變的轉折之處外，還有一個就是學術形成的源頭所在。漢賦與《詩經》學的關係探討，必然繞不開漢賦與《詩經》的淵源關係的爭論，章滄授即從此著力，在詳細考察、分析材料的基礎上，較為全面地論述了「漢賦的名稱與詩經」、「漢賦的內容與詩經」、「漢賦的形式與詩經」等問題，認為漢賦的諷頌思想來源於《詩經》；漢賦敘事之源頭來自與《詩經》苑囿、田獵等內容有關的詩篇，贊成陳子展的《詩經》「虛詞濫美，已開漢世辭賦誇誕之漸」的說法，指出《詩經》大量的現成語詞、句式和修辭手法等都為漢賦所襲用。³⁸ 從主題內容上來探討漢賦與《詩經》的關係的成果較多，如于雪棠〈《周易》、《詩經》及漢賦狩獵主題作品之比較〉³⁹、翟翠霞〈《詩經》與漢賦美人形象之比較〉⁴⁰ 等。漢代《詩經》學對漢代的辭賦觀和辭賦創作的影響也非常明顯，譚德興認為在兩漢經學極盛的大背景下，「辭賦的創作與批評沒有超然於經學這種時代發展的主流思潮之外。」它們之間的聯繫「主要表現在以《詩》評《騷》、據《詩》論賦以及辭賦作品的采《詩》用《詩》中」，而這些則「充分體現了兩漢時期經學文學化與文學經學化的互動特徵。」⁴¹ 郭令原認為：「東漢作家由於對《詩經》認識不同，在賦的創作中，一些作家注重接受頌德和諷諫內容，以表達自己的政治願望；另一些作家則從文學方面吸收《詩經》的養分，表現個人對現實生活的感受。就文學史而言，後

34 劉培，〈經學的演進與漢大賦的嬗變〉，《南開學報》2001.1: 68-72。

35 馮良方，《漢賦與經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2。

36 聶石樵，《先秦兩漢文學史稿》（兩漢卷）（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頁14-16。

37 王思豪，〈《神鳥傳（賦）〉引經、子文譚論〉，《東南文化》2009.4: 88-93。

38 章滄授，〈論漢賦與詩經的淵源關係〉，《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科版）》1990.2: 63-69。

39 于雪棠，〈《周易》、《詩經》及漢賦狩獵主題作品之比較〉，《中州學刊》2001.1: 102-106。

40 翟翠霞，〈《詩經》與漢賦美人形象之比較〉，《樂山師範學院學報》2001.5: 44-48。

41 譚德興，〈論《詩》學與兩漢辭賦觀的發展——經學與文學關係之考察〉，《貴州大學學報（社科版）》2003.1: 70-76。

者的意義固然重要，但前者的作用同樣不能忽視。」⁴²

漢賦引《詩經》研究也日漸受到學界重視，董志安〈以《詩》觀賦與引《詩》入賦〉一文是這個方面研究的典範之作，該文首先就「漢人以《詩》觀賦、以《詩》論賦」現象作了論述，認為這「從一個方面反映了此一歷史階段之經學化了的《詩》學觀。」⁴³接下來，作者又立足文本，對漢賦中的引《詩》資料作了一些整理，發現「很多是藉稱《詩》以宣講儒道、張揚經學」，更值得重視的是，「有一部分則重在援引古詩原有的蘊義和詩文本身，或援用詩典，或化用詩意，或引用詩句，客觀上已經具有了文學借鑒的意義。」⁴⁴據此，作者總結道：「《詩》三百一經流傳，就不斷產生雙向的影響：既是政治的、經學的，也是詩學的、文學的；漢人以《詩》觀賦與引《詩》入賦，又於此提供了新的例證。」⁴⁵曹建國、張玖青〈賦心與《詩》心〉一文也分一節對漢賦引《詩》作了論述，認為「漢賦大量引《詩》化《詩》，使得賦在言語的層面更加趨於詩化」，「在漢賦引《詩》的進程中，揚雄是關鍵性的賦家」，文章稱揚雄是漢賦作家中「第一個自覺引《詩》入賦的人」，東漢以後引《詩》入賦更為普遍，整體而言，《詩經》對漢賦的影響「可以區分為經學的、文學的兩種，但總的趨勢是文學影響越來越大」。⁴⁶

就筆者所檢，目前系統地論述漢賦與《詩經》學關係的大文章，只有金前文的博士畢業論文「漢賦與漢代《詩經》學」，⁴⁷金文主要是從淵源、主題、體裁、寫作技法等方面，較為深入地考察了《詩經》學對漢賦的影響，認為：「漢賦創作之所以表現出鮮明的《詩經》學特徵，是由於賦家接受《詩經》學影響的緣故。」在主題上，漢賦以闡發君「德」、宣揚君「仁」，「講求孝、節儉戒驕淫、以民為本、致任賢能、省刑罰興教化、不窮兵黷武、守義戰」等思想，這與《詩經》學的「諷」「頌」特徵密切相關；在題材上，漢賦選用以「與君的舉止進退施用密切關聯的宮室臺榭、田獵、祭祀、樂等

物件或事項」，這是對四家《詩》學精神的貫徹；在寫作技法上，漢賦「以誇飾為主，並用史、讖緯、雜說等材料來衍文，多模擬」，這與「四家說《詩》，或取《春秋》，或采雜說，表現出了用史、雜說、讖緯說《詩》的特點」是一致的。據此，金博士指出：漢賦「始終是以《詩經》學的附屬物出現的，並沒有獲得獨立的社會地位或達到『文學的自覺』。」⁴⁸金文系統地論述了漢賦與漢代《詩經》學的關係，開創之功不可抹煞，但從總體結構來看，第1章〈漢代《詩經》學的興起和發展〉、第2章〈四家詩對儒家思想的闡發及其說《詩》傳《詩》特點〉、第3章〈兩漢賦家賦作〉，均屬泛論，並沒有觸及到問題的關鍵，如果沒有太多新見，不妨心中感知亦可。至第4章〈兩漢賦家的《詩經》學淵源〉、第5章〈漢賦與漢代《詩經》學〉才談到了論文的主題，第4章整理出兩漢賦家的《詩經》學淵源，考論之功甚著，但並沒有緊密聯繫賦作，雖注意到了漢賦引《詩》的一些材料，但沒有做系統而完整地爬梳辨識，只列出一二處論之。第5章真正觸及到了論文的核心問題，分為3節論述：漢賦主題與漢代《詩經》學；漢賦題材與漢代《詩經》學；漢賦寫作技法與漢代《詩經》學。金文的結構安排顯然是重漢代《詩》學而略漢賦，有各自為陣未能融合之感，這樣的一種權衡，或許不利於發掘出漢賦在漢代《詩經》學闡釋與傳播中的實質性作用的。

五、結語：研究存在的不足及幾點思考

百餘年來，前輩時賢著力於漢賦與《詩經》學關係的探討，筆耕不輟，他們的專著與論文筆路藍縷，創新發微，對我們今天的研究極有參考價值和啟發意義。但也還存在一些問題與不足：首先是散點研究比較繁盛，而綜合研究相對冷落，如對「賦者，古詩之流」說的論述，自古至今，論者往往是各自據為己用，缺乏系統而

42 郭令原，〈論《詩經》對東漢賦創作的影響〉，《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2003.2: 149。

43 董志安，〈以《詩》觀賦與引《詩》入賦〉，《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02.3: 46-49。

44 曹建國、張玖青，〈賦心與《詩》心〉，《文學評論》2008.2: 141。

45 金前文，「漢賦與漢代《詩經》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6）。

有規律性的全局觀式的探究。其次是本論題的相關研究大多集中於漢賦與《詩經》在主題內容、語言形式的探討，因襲多而創見少，並未深入到文本的深層去探究。漢賦與《詩經》學之關係的研究，當前還只是停留在一種表像的淺層次的探討，均未能深入到問題的內部，獲得實質性的結論。第三，未能對漢賦引《詩》、用《詩》的材料進行系統地爬梳和整理，多是舉出一、二例，便粗疏立論，這樣難免會一葉障目，未能識得全林。第四，漢賦引《詩》、用《詩》在《詩經》學史上的意義和貢獻未能得到充分地重視和研究，學術界關注其在經學意義層面的貢獻較多，而對漢賦的創作與傳播在對《詩經》的文學層面的闡釋卻流於表面化。

緣此，我們不揣淺陋，為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提供如下幾點思考：

- (一) 賦體源流的問題，學界爭論紛紜，成果層出，但有待解決的問題還有很多：著意於圍繞「賦者，古《詩》之流說」為中心，解讀其中所蘊含的二元傾向，探討其如何在經學話語的影響下成為賦論的關鍵所在？系統地梳理出歷代文士對「賦者，古詩之流」說闡發的系譜，探討這其中的「尊體」途徑是怎樣實現的？賦學理論是如何在「賦之詩源說」這頂保護傘下得以生存、延續和創新的？一些常見術語，如「賦心」、「賦跡」說的本義與延伸義有了什麼變化？循此討論，期以得出一個為何如此及有何作用的結論。
- (二) 仔細爬梳漢代賦作中引《詩》、用《詩》情況，開掘這部分文獻中的有關《詩經》學的資料，仿官家斷案之法，逐條條列分明，尋覓出漢賦的創作與傳播對漢代《詩經》學的發展所起的影響蹤跡。我們採取原始而笨拙的「數據排比法」，具體操作如是：先逐條分列出漢賦引《詩》條目；然後輔以

魏源、陳氏父子、王先謙等清儒的輯佚成果，在其下依次臚列出《魯詩》說、《齊詩》說、《韓詩》說、《毛詩》說；如果今有新的出土文獻資料，再附於後；最後整體爬梳，前後披尋，逐條辨識出賦家引《詩》家數的蛛絲馬跡。據此，我們試圖探討《詩經》在漢賦形成、發展、鼎盛過程中究竟起到了什麼作用？漢賦是如何在實際創作中實現「依經立義」的，其對《詩經》的經學闡釋又有什麼樣的貢獻？

- (三) 古代文學研究應用兩條腿走路，不僅要關注「古代的文學理論」，還要重視「古代文學的理論」。⁴⁶ 本於此，探討漢賦作品中的《詩》學理論批評，希冀對漢人《詩》學觀的理解與論述有所裨益，這是我們未來研究的一個目標。漢賦引《詩》、用《詩》蘊藏著豐富的《詩經》學文學闡釋材料，其中一個重要的現象是「《詩》曰」的隱去，這與先秦典籍以及《史記》和漢代政論文之用《詩》格式絕然不同，這種引《詩》方式又有什麼內在的意蘊，對後世五、七言詩的興起和發展又有怎樣的影響呢？

漢賦與《詩經》的關係是比較深隱的，絕非流於表層的主題、題材與結構形式所能總結和概括的。如何全面展現《詩經》對漢賦的創作及其傳播、接受，以及漢賦對《詩經》的闡發、批評的問題，是漢賦與《詩經》學研究的一個重點，也是難點。我們認為：應以漢賦作家的受學情況為背景，以漢賦文本中用《詩經》、論《詩經》的文字為主體，以《詩經》學思潮之發展為根基，以漢代賦論為參照，探討漢賦作家的《詩經》學思想，《詩經》學家的賦體觀，進而構建一個立體的、多層面的辭賦與《詩經》學的互滲圖景。

46 程千帆，〈古典詩歌描寫與結構中的一與多〉，《古代文學理論研究叢刊》第6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19。